



中国近现代思想
文化史料丛书

刘师培论学论政

李妙根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 逊

刘师培论学论政

李妙根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 465,00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9-00170-2/K·09

定价: 13.65 元

序

朱 维 铮

—

谁曾留心清末民初的历史，谁就不会不知刘师培。

确实的，从辛亥革命前夜到五四运动中间，那十五六年里，这个人不论在学林，或者在政坛，都留下了一串脚印，以致人们不能不予以注意。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才活了三十六岁（1884～1919），——倘据孔夫子的智能界定标准，则他未及“不惑”之年便死去了。

不过，只要略加考察他的那串脚印，便会发现它们显示着双重轨迹：一行属于学术的，特色是“不变”；另一行属于政治的，特色是“善变”，而且是倒行式的变化。

双重轨迹的反差如此分明，令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联想：这个人的两只脚，踵尖位置似乎生来是互倒的，并且各自为政，因而在各走各的路。

这个比喻当然是笑话。事实呢？当我们注意到刘师培在政治上善变，而变化的方向是倒行的，这时便已默认他在这方面曾经前进过，向前的步伐也许太急促过。因此，他以后转身逆行，才那样惹人注目。

短暂的一生，文坛的巨子，政治的浪子，既得聪明益，又被聪明误，加上还有个行为同样奇特的妻子何震，如此错综的思想矛盾集于一身。像这样的人物，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虽然

不算绝无仅有，却可说是某一类型的化身，当然值得研究，也应该研究。

二

生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的刘师培，字申叔，号左龢。他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世居江苏仪征，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而且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但连同他父亲刘贵曾在内，这三代人都功名蹭蹬，不是终于老贡生，便是止于副榜举人，仅刘毓崧做过一任八旗官学教习。

自幼浸染这样的家族文化气氛，刘师培从开蒙起便饱读经书，很快表现具有超常智力，所谓过目成诵，而且八岁便学会《周易》的变卦法。他又是独子，当然被父辈寄予过大的期望。

恰好在本世纪开端那一年(1901)，刘师培刚十八岁，便中了秀才。次年，又一战而捷，中了举人。少年得意，神气可知。不料，1903年他赴汴(开封)会试，竟落了第。按说初次失败，不该使他放弃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况且他只有二十岁。但他却沮丧之极，感到“飞腾无术儒冠误”(《甲辰年自述诗》，见本书附录)。

带着这种心情，刘师培踏上归途，路经上海，意外地结识了章炳麟。章炳麟的经学研究早已饮誉学林，又素来钦仰仪征刘氏的世代经学，与刘师培在学问上臭味相投，自不必说。但章炳麟这时又已是屡受清政府通缉的著名革命家，正与他的爱国学社同事们，在上海租界里通过办学办报大嚷“排满革命”。刘师培顿时思想大变，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中国教育会的一员。这年三月，他便在《苏报》上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公开宣布自己决心革命去了。不久，他便改名“光汉”，著作《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钱玄同语)的决心。

1903年夏天上海发生震动中外的《苏报》案。章炳麟、邹容被

捕，关在上海的西牢里。刘师培倒没有被吓倒，反而更趋激烈。就在这以后，他与蔡元培、叶瀚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以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形式继续反对媚外卖国的清朝政府。

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等共同担任主编。他又相继参加蔡元培等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拥戴还在狱中的章炳麟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这时他为《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撰写的反清革命文字，集中鼓吹“排满复汉”，甚至署名也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就在此时，他回乡探亲，不及举行传统婚礼，便携带未婚妻何班急返上海。何班随即进入爱国女社就读，很快也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和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并为显示争取男女平等起见，将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

刘师培也没有忘情于他的“家学”，并认为这家学就代表国学。1904年末他参加邓实、黄节等发起的“国学保存会”，并成为该会在1905年初创办的《国粹学报》的台柱。他的学术论著，大半见于这份学报，因而被目为“国粹派”的为首人物之一。

1904年冬上海发生了谋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刘师培是策划人之一。1905年初他曾前往被日本占领的台湾。这年三月《警钟日报》终因骂了德国侵略者而遭租界当局封禁。刘师培在上海呆不住，避往浙江领导秘密会社活动。不久又经镇江赴芜湖，化名“金少甫”，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并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秘密扩充光复会力量。

1907年2月，甫及二十四岁的刘师培，携妻挈母东渡日本，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立即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之一。这年四月后出版的《民报》，相继刊出他署名“韦裔”（“求韦之裔”略称）的《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都可说是他一生所作最好

的政论文系列，既有时代感，又有书卷气。例如《悲佃篇》，在揭露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不能解决民主革命根本问题的深度上，胜过章太炎同孙中山讨论后写成的《定版籍》。

然而，刘师培、何震夫妇，也许太年轻的缘故，东渡伊始便为日本的社会党“硬派”的所谓直接行动主张所迷住，思想急剧向无政府主义方面转变。1907年6月，即他们到日本仅三个月，何震发起的“女子复权会”，便另创机关刊物《天义报》。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比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新世纪》还早。刘师培便是《天义报》的柱石。接着，他俩居然又打动了同盟会的主要宣传家章太炎、张继，与他俩共同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间大讲其无政府主义。

从1907年6月到1908年8月，是刘师培、何震夫妇的政治主张“激烈”到顶峰的时期。他们向中国人介绍《共产党宣言》，介绍1905年俄国革命，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介绍西欧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介绍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妇女解放运动，等等。根据《天义报》曾发表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推测，在我国出现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份中译本，很可能是刘师培组织翻译并刊行的，可惜至今没有找到译本作证。但无论那时刘师培、何震夫妇的动机如何，他们至少使中国人进一步粗略得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点上功不可没。

出于至今还是谜样的理由，刘师培、何震夫妇竟与章太炎决裂。从1908年初起，章太炎便与他们同租一处合住，同住的还有何震的情夫汪公权。或许因为章太炎看不惯何震、汪公权公然无视刘师培在前而双飞双入的行为，或许因为何震、汪公权嫌章太炎在面前碍眼，总之他们闹翻，迫使章太炎搬出刘寓，成为轰动东京留日学界的新闻。接着便发生有名的“毒茶案”，很快查明是汪公权在茶中下毒，想谋杀章太炎。一时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

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

就在这中间，日本政府应清朝政府要求，封禁《民报》等留日学界七种中文报刊，《天义报》也在其中。刘师培、何震被迫宣布《天义报》停刊，同时却宣布在澳门续出《衡报》。当然，假托不能持久，《衡报》于1908年8月出至十期以后，便不见下落。那时“毒茶案”的真相已大白，牵连疑及刘师培。他在日本东京站不住脚，被迫与何震、汪公权相继回国。

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因而如果说，由上海至东京，除了作文以外，在生活中，刘师培处处受何震的挟持和左右，这看法大约离事实不远。因此，刘师培不了解何震，何震却了解刘师培。汪公权早已是清朝政府安插在革命派内部的密探。于是汪公权可以通过何震而挟持刘师培，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果不其然，刘师培回国以后，便致函代誓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常务的黄兴，控告章太炎，说他曾写信给清朝当权大臣端方，只要对方出资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为僧。这话有影子吗？有的，因为章太炎曾同孙中山争论，失望之余，的确曾想出家当和尚，赴印度静修。但这时，《民报》正同日本警视厅打官司，章太炎正作为《民报》代表人而反抗日本政府的专横决定。在这时，刘师培来函暗示章太炎已受清政府大员收买，其恶劣影响可知。

又果不其然，在巴黎的吴稚晖等人，立即抓住刘师培、何震夫妇抛出的线索，进一步诬称章太炎和《民报》早已受清朝政府收买。由此挑起孙中山对章太炎的憎恶，由此又挑起所谓“伪《民报》检举案”，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究其初因，刘师培、何震难辞其咎。

或许由于何震早已通过汪公权同端方勾搭的缘故吧，刘师培

回国后便成为端方的幕僚。他的《上端方书》，很快在革命党人中间流传。但他入端方幕后，仍继续与同盟会员，尤其是光复会员往来。这却使革命党人丧失警惕，以为他投奔端方乃出于不得已。

岂知1909年夏天，江浙革命党人策划起义，被刘师培得知，便向端方告密。于是便导致端方通过上海英租界当局破坏起义机关的事件。光复会地下领导人王金发盛怒之下，找到刘师培要枪毙他。刘师培下跪乞命，保证说服端方饶被捕党人首领性命；但他没有保住汪公权性命，这人被王金发当场击毙。

刘师培吓破了胆，便以“正人心”为名，向端方建议开办学堂以培养教员。从此他随端方赴天津，至四川，都以“存古”的经学教师面目出现。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端方被所部鄂军官兵杀死。刘师培逃往成都，入四川国学院任教。这时，在上海与黄兴、宋教仁共同主持革命领导事务的章太炎，不念旧恶，于1912年初与蔡元培共同署名，登报找寻刘师培的下落。但刘师培似乎不愿置答。在成都混了一年后，随即由上海赴山西，投入阎锡山幕下，充任高等顾问，而何震也到阎府担任家庭教师。这年为民国三年，刘师培三十岁。

次年即1914年，经阎锡山推荐，刘师培偕何震至京。第二年即1915年，先被袁世凯任命为公府咨议，继又署理参议院参政。他上任之际，正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时。在袁世凯的默许下，“筹安会”成立，六名主要发起人中又有刘师培。据说他没有参与实际活动，但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使他又增添了一份耻辱。

1916年，三十三岁的刘师培，打破了赴京年余的沉默，开始重讲“国学”。但一篇《君政复古论》，尽管只刊出了上中篇，下篇未及刊出而袁世凯就一命呜呼，却使作者不能如严复那样取得舆论的

宽恕。袁世凯死后，刘师培只好狼狈遁入天津租界。

幸而昔日朋友仍不念旧恶。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便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以示认真实行“兼容并包”方针。

刘师培到了北京大学，尽管由于口吃、肺病，课堂讲授不行，但靠编讲义弥补，“很受学生欢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

不幸刘师培做教授也不得安稳。随即“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的浪潮首先冲击北京大学。这回冲到了刘师培“不变”的底蕴，即所谓国粹。他受不住了，再次充当反动派的首领，于1919年1月纠合北京大学师生，成立《国故》月刊，自任总编辑。这一行动，受到《新青年》派的尖锐批评。鲁迅致钱玄同函，便称他的刊物为“国粹民报”，称他本人为“侦心探龙”——借他提倡《文心雕龙》而讽刺他当年向端方卖消息的行为。“国故”当然敌不过“新潮”。这年三月，刘师培致函《公言报》，便不得不否认《国故》与《新潮》作对。

然而办《国故》是刘师培的最后一搏。1919年11月，他便因肺病，去世于北京大学。他死后，何震随即精神失常，幽闭以终。

三

在刘师培去世十七年时，蔡元培替他写了篇小传，于文末感叹：“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见本书附录《刘君申叔事略》）

就学术论学术，这话也许有道理，但那将是怎么一个刘师培呢？

“不为外缘所扰”，倘指恪守“家学”，则中国无非多了一位刘文淇式的汉学家，他可能将三世没有藏事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

证》续成，如章炳麟所期望的，但成就不过止于此类；倘指不问政治，则只能要求他同革命思潮绝缘，而不可能要求他同清朝统治绝缘，需知谋求仕宦也是他家族的传统，因而以后固然不会出现“同盟会叛徒”刘师培，仍然可能出现作为端方幕僚而与革命派为敌的刘师培，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拥护帝制复辟的刘师培。

可见，单用“假设”法，也不能证明刘师培必然“尽瘁于著述”。况且我们面对的是已成历史人物的刘师培。他已为“外缘所扰”。他已因肺病早死，尽管这病未必同他的政治欲望有关。他留下了一大堆论学论政文字，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因此，蔡元培对他的惋惜可以理解，那是一位长者回忆一个有学问而无特操的友人时常见的叹息，但不足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依据。

前面说过，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刘师培无疑可称得上某一类型的化身。

这类人物，对传统学说了如指掌，对外来事物感觉敏锐，能思考，会议论，谈学问或说政治都不同凡俗，属于那时代文化教养甚高的层次。他们在租界或在异邦鼓吹“排满革命”，固然算不得大勇，但公表自己反清政府反旧传统的言论，仍然要冒被捕、坐牢乃至杀头的风险，属于那时代与书斋中学者很不相同的勇武之辈。

刘师培在这类人物中还要特殊。他自结识章炳麟、蔡元培等人以后，短短两三年间，便由主张“教育救国”，而主张“民主共和”，而主张“农民革命”，而主张“社会主义”，而主张“无政府革命”、“共产制可行于中国”，就是说他的思想，不仅趋时，而且超前，节节跳跃，激烈的程度之高、速度之快，真堪称“激烈派第一人”。

然而正是这个人，当他刚刚登上激烈的颠峰，却突然转向。

转向的程度之烈、速度之猛，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想一想吧，当人们正在为《衡报》末几期主张“无政府”、“共产制”的言论而感到震动的时候，谁能料到它的作者已写下《上端方书》，投入了捍卫清政府镇压革命的行列中呢？

不错，刘师培投入端方幕中，才二十六岁。后来章炳麟向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保他，正是以他年轻误入歧途作为一条理由。但刘师培却不领情。章炳麟求情照准，拉了蔡元培在报上共同署名大登广告，“求与刘师培通信”，而刘师培则置诸不理。以后他又投靠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又作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噪。蔡元培再次宽恕他，主动聘他做北大教授。但他仍不感恩，明知蔡元培同情新文化运动，还是纠集北大一批教授学生公开反对，直至他病死。看来他后九年反对革命，同前六年鼓吹“革命”，同样激烈，大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气概。

怎么理解他前后两段时期的相反两种“激烈”呢？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

四

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不等于说没有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凡是必然性失效的地方，历史便完结了。这条为恩格斯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我想也适用于刘师培的思想研究。

但是，从三十年代中期蔡元培企图用一篇短文替刘师培盖棺论定以来，人们便很少注意刘师培。

这不是说刘师培已经盖棺论定了。我在前面已提出，蔡元培的意见不能视作定论。然而，或许由于时移境迁，人们不愿重提作为学者的刘师培那段不光采历史，因而自五十年代以来，学者们虽然没有忘记刘师培，但提及的都是他的学术，而不是他的政论。

刘师培生前曾经自编文集，名为《左龠集》，共八卷，但只发表了目录，到1928年即他死后九年才由北平一家书店刊行。此集大部分收的是学术论著，就是说他已通过自编文集来掩饰自己的变节行为。

1936年由钱玄同等编辑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共收刘师培已刊未刊论著七十四种。这次编辑，除了收入论学著作，还据旧杂志录入论政著作，保存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也使蔡元培睹文思人，发出前引的那一感慨。

但钱玄同等编的这部《遗书》，既有遗漏，还有隐讳。比如刘师培在《天义报》、《衡报》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文字，便有多篇不见收入。由于原著刊于同期而收录刊落可以互勘，因此可以证实刊落并非出于无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师培的学术著作没有被完全忘却。五十年代，他关于《古书疑义举例》的补证，他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他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的“论文杂记”，都已校点重收。而他编的《中国经学史》教科书，虽然只有一册，也被周予同教授引为参考教材。

然而，就刘师培研究来说，这都属于一枝一节。枝节需要研究，但枝节并非全树。见叶不见树，与见树不见林，顶多可说是以五十步非笑百步。

因此，如果将刘师培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个案研究对象，那末第一步，当然先要搜集他的遗文，包括已知的佚文。在材料较全面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五

由于需要研究章太炎，必然连及刘师培，因此在七十年代中

期，我便留意搜集刘师培的材料。

只是个人精力到底有限。我用了好几年时间，对刘师培的史料搜集，仍然只能算“旁及”。1978年10月李妙根同志当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首届研究生，由我担任他的导师。这时我发现李妙根同志对于刘师培思想研究颇有兴趣，便同意他选此专题作为硕士论文课题。李妙根同志用了两年时间，撰成了《论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论文，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其后他留复旦大学任教，不久又调空军政治学院任教，都在继续研究刘师培。

这部《刘师培论学论政》的集子，便是李根妙同志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一。忝居导师，我原要求他编出一部《刘师培政论集》，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附录。但没想到他供过于求，放在我面前的竟是一部刘师培论学论政的完整稿件。

当然，现在还不是出版刘师培“全集”的时候。读者或者需要窥见到刘师培著作的全貌，但编者不能不替出版者考虑。种种原因，使我们的出版物，印万部尚且不能保本，难道忍心迫使出版者印千部而大亏吗？但保本亏本的界限有时很难说。假定某书畅销，纵使印上五千部，定价略高于成本，很快卖掉，那也能够保本，我估计给刘师培编部“选集”，大约能合此要求。因而，李妙根同意我的建议，先编一部刘师培论学论政的选辑，使读者以斑窥豹。

经过将近三年努力，这部书编出来了。当去年冬天李妙根同志拎着厚厚的两叠原稿来访问我的时候，已是 he 获得学位后的第五年。就是说，他的心血，用在这课题上，已有八年。虽说中国人民曾用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但这个数字未必能引人重视。某个芝麻绿豆大的什么问题，只要某人不满意，“审查”个三二十年不是常事吗？假使刘师培还活着，只要冲着他在一年多里曾经投靠端方一事，便足以审查六十四年，何况只有八年。因此，对于此书编了八年，审了八年，我便不介意了。但一不介意，我又

发现我作为审阅者，竟又在八年之上加了一年。不记得李妙根同志将清稿送来，那时我正忙于另外一件什么事，总之将稿子扫视一遍，便说可以的，请他留下。

岂知留下以后，倏忽又冬去春来，夏尽秋至。我虽然已通阅全稿，但答应编者的诺言，即撰写此集的前言，一直没有兑现。

但是，依据原先的计划，复旦大学出版社已将此稿列入1988年的出版方案。它的责任编辑孙逊，也是我的学生，年纪虽轻却已善于催稿，每次见我总是笑嘻嘻地提到这部那部稿子，冷不丁地便询问我某稿何时交出，其中一部便是此稿。面对这位能干的小编辑，我毫无办法，被催一次便惶惑一次，终于下决心写出这篇小文，权以为序。

1987年10月于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



编辑说明

一、本书编选资料，以刘师培一九〇三年在《苏报》上撰文至一九一九年逝世前的单篇论文、札记、序跋、随笔为主，间采部分专著或其某些章节，酌收书信；其所编教科书，酌收序、凡例及个别章节；诗、词、赋、墓志铭及传状等，概不收录。

二、本书编选资料，上编以论学为主，下编以论政为主；其“混政学为一”的篇章，由编者酌定入上编或下编。

三、本书编选资料，凡有撰著时日可稽，或经推敲大体可以确定的，一律以撰著时间为序；如果撰著时间不详，则以最先发刊年月为序。难于肯定写作和发刊时间的，排于末尾。

四、本书编选资料，一般都据最初刊载的报刊录入，标明报刊名称、发刊年月，采用原有标题；其已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者，则在篇后注明，以便查对。

五、本书编选资料，均予标点分段，凡肯定是误植的，下加[]，凡肯定是脱字的，下加< >，并将正字、脱字注于[]、< >之中。凡缺字，或期刊报纸汗漫无法辨认者，用□号标出。

六、本书编选资料，易竖排为横排，相应改行文中“如左”为“如下”；改原繁体字为简化字，但某些论小学之作，如改易字体致易引起误会者，则不予改动。

七、本书编选资料，必要时酌加题注，附注于正文之后。

八、本书编选工作始于编者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承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诸师鼓励，

朱维铮老师指导尤多，并为撰序言，谨此致谢。

九、书末附录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编者所纂《刘师培生平和著作系年》。

十、限于编选者的学力，不当之处，盼前辈、专家和同志们赐正。



目 录

上 编

中国文字流弊论(1903年)	3
国文杂记(1903年)	7
读左劄记(未完)(1905年2月23日—12月16日)	13
景教源流(1905年3月25日)	37
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年3月25日—10月18日)	39
谶纬论(1905年7月22日)	73
汉宋学术异同论(1905年7月22日—9月18日)	78
《经学教科书》序例(1905—1906年)	97
汉人之称所自来(1906年10月7日)	99
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年3月4日)	100
舞法起于祀神考(1907年4月2日)	105
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年5月2日)	110
清儒得失论(1907年6月8日)	117
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1907年7月29日)	128
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年7月29日)	133
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未完)(1907年8月23日— 9月22日)	136
古书疑义举例补(1907年10月26日—1908年8月16日)	143
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1908年10月14日)	161
格物解(1910年)	164
释谊(1910年)	166